

文化中国行  
多彩贵州文化新风采

# 《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

## 区域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12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的文章《从“刊布”到“激活”——评〈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由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和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资助,孔学堂书局出版。该丛书由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担任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历经10余年潜心钻研,对贵州清水江流域天柱县的7500余份文书展开系统整理与深度考释后完成。全书共三辑44册,为国内首部系统性整理清水江文书的专著。

明成化二年田土清退契约。资料图片

清水江系列文书均采用“文图对照”的形式编排。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珊珊 摄



《阳明文库》。资料图片

### 学术创新,文献“复活”

除了《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近年来,贵州在保护传承各种文獻遺產,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开展了大量生动实践。

于2016年正式启动的贵州省重大文化工程、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古籍文献丛书《贵州文库》,以精装点校、精装影印和线装影印3种形式,收录和整理贵州古籍文献(包括少数民族文献),填补了贵州古籍文献集成出版的空白。本着“精选精编精印”原则,《贵州文库》主要收录有贵州籍代表人物代表作品、非贵州籍人士在贵州工作生活期间的代表作品,以及其他涉及贵州的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作品。如此对本省古籍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是贵州建省600余年来未有之盛事。

于2019年启动,由孔学堂书局出版的《阳明文库》,以阳明文化为核心,多角度、深层次挖掘阳明文化资源,高水准、全方位汇聚和推出海内外阳明学研究精品力作,填补了全国乃至全世界阳明文化研究成果系统性、规模性出版的空白。其中的“黔中王学”系列,努力挖掘阳明学在贵州的传承发展,以图书集成的形式向世界展现黔中学派对王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在王阳明龙场悟道的500年后,这部诸多方面在阳明学研究专著中尚属首创的集成式图书,是对王阳明当年的贵州足迹作出的庄重回应,也代表着对阳明心学所影响的今日世界、今日学术思想和世道人心所作出的“贵州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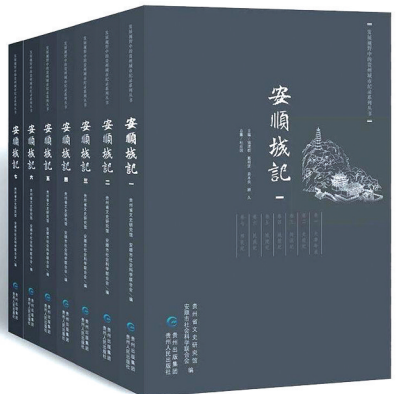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承贵通过《阳明文库》看到了贵州在学术传播之外的深意:“在阳明文化建设上,贵州省的雄心与作为,使其成为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大潮中的引人瞩目的标杆;而在践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理念上,贵州省则是无可争议的、出类拔萃的典范。”

2020年,由钱理群、戴明贤、顾久、袁本良任主编,杜应国为总纂,耗时8年终于出版的地方文化史志《安顺城记》,以全新的视野、观念和方法,聚合了安顺、贵阳两地的本土作者——涵盖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6代地方文化爱好者与研究者。

在2021年4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共同主办的“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与青年新锐研究者以《安顺城记》为例,共同探讨“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问题。与会专家把《安顺城记》定位为一部“融多学科为一体的新型地方志”,也是一部“由小地方、小人物撑起来的‘新史学’的尝试之作”,它“恢复了学科化以后的历史叙事中长久消失了的‘人’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一种“现代地方志的书写范例”。

钱理群因此感慨,贵州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由“被描写”到“自己描写自己”,再到“居于全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前沿地位”,这样的历史过程,大大增强了贵州人的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对于在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基础上建构“黔学”,钱理群认为挖掘地方文化史料是第一要务。他认为正如贵州安顺学者杜应国所说,要从两大方向入手:“一是从内部深度挖掘,搜寻各种散落在民间的文献资料,包括笔记、日记、家谱、信函、碑刻,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宝贵的口述史料和历史遗迹;二是从外部搜寻各种外地、外省、外国人士有关贵州的文字记述。”在这方面,贵州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地方文化史志《安顺城记》。资料图片

### 贵州的“冷门绝学”

以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为代表的学术团队,多年来对清水江文书进行了全面搜集、系统整理和深度考释。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新民说研究清水江文书是他意外闯进的一个学术领域:“2002年调入贵州大学后,由于各种偶然的机缘,我得知清水江流域遗存有大量民间契约文书,数量之丰厚完全可与徽州文书媲美,但如不及时抢救整理,完全有可能散佚流失。”自此之后,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抢救保护,并潜心研究清水江文书。

张新民认为这项艰巨的工作虽苦犹乐:“如同考古学者发掘文物遗址,还原历史的真实乃是必须的工作一样,研读文书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还原历史固有的真实。表面看文书都很琐碎枯燥,但一旦从中了解到乡土中国的真实,梳理出乡土社会知识与价值的系谱,又会感到乐趣无穷。”至于具体的工作方式,他说:“我想一方面要找到文书与文书之间的内在关联,将散见的点联成有知识逻辑关系的线,然后将线联成有完整人物故事的面;一方面则要开展田野调查,接触乡民活生生的故事记忆,将田野资料与文书资料互证互印,最后才能还原历史真实。”

2025年6月18日,这套《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在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进行了新书发布。

贵州省文史馆原馆长、文化学者顾久在现场发言中认为,清水江文书作为“底层历史”的记录,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这些文书从经济学的角度以及利益的角度,展现了生活在清水江流域的各民族如何通过日常经济活动实现紧密连接与融合。在顾久看来,文书提供了“真正来自民间的、底层的声音”,弥补了官方记载的不足。

全国学术界的专家们对《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均作出高度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盛赞清水江文书为贵州的“冷门绝学”。他指出,这批承载着清水江流域500年历史记忆的珍贵文献,不仅是地方文化深厚积淀的见证,其学术价值更足以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知名地域性史料比肩。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认为,“清水江文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古典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熊昌钰则说,清水江文书是理解乡土中华民族边疆与国家治理的重要窗口,它不仅承载了贵州边地的历史记忆,也参与塑造了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根基。他还认为“清水江文书彰显了学术公共化与社会转化的能力”,该研究在文献出版、学术传播和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生产体系,在公共史学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也对地方政府文化政策、档案保护意识、民族认同建设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大型古籍文献丛书《贵州文库》。资料图片

### 专访

近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出版,全书收录并考释了清水江流域大量珍稀的民间契约文书。这套丛书是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担任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历经10余年系统整理与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结晶。

12月16日在贵州大学校园里见到张新民教授时,已经是下午4点,冬日阳光西斜,夹杂一丝寒气。张新民教授带着记者穿过中国文化书院的魁学堂,前往办公室,“我们借他们场地一用,那里暖和一点。”今年已经75岁的张新民,言行间透着天然的亲切感。

当记者说明来意,他笑着摆摆手:“随便问,但问题要大声一点,我耳朵不太好。”随即又补了一句:“放心,我不会说你凶我的。”



年过古稀的张新民仍在研究清水江文书。受访者供图

#### “我们是为未来铺路的人”

清水江文书时间跨度从明代直至20世纪中叶,内容涵盖土地、山林、房屋买卖租佃,婚嫁、诉讼、宗教活动等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被誉为“西南版敦煌文献”,是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社会历史文化的宝库。

“观察认知中国文化,不能只从一个视角来观察。整体地看,我们的学术研究,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西南观察的视角,否则认知华夏文明便会有偏差。”张新民认为,清水江文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因为其中涵了大量乡村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活”的遗迹,为理解传统民间社会复杂多样的人际交往互动关系,尤其是族群与族群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流融合关系提供了翔实的原始文本依据。

“老天给我们留下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实属人类历史文化的万幸。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术文化整理研究工程,我们是怀抱理想开垦荒地,希望未来的学术园地枝繁叶茂。”此次共出版44册文书考释专著,加上此前出版的《天柱文书》,以及近20项专著成果,截至目前,张新民参与编撰的清水江系列已有60余册文本成果,“算下来文字量有2000多万字”。谈及这项耗时10余年的“大工程”,张新民的语气平和而坚定。

这项工作由一个20余人组成的团队完成,核心成员来自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及凯里学院,也与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宏德出版基金等机构的学者有深入合作。“我仗着年纪大,敢施号发令,大着胆子做他们的‘统帅’,从头至尾负责整理工作。”提起团队,已过古稀之年的张新民,言语语气充满了谦逊。

然而,契书的辨识考释难度极大,且这样的基础整理工作在学校考核中并不占优势。“团队成员都有做研究、发文章的能力,但大家还是在这个冷板凳上坐了10余年。”张新民说,“敦煌文书研究了100年还在继续,徽州文书研究了六七十年仍在发展,严格地讲,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未来的研究空间相对更大。我们现在的文书整理考释工作,不过是给未来的学术研究架桥铺路,100年甚至200年后,一定还有人利用这些原始材料,发表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不过是荒山开矿的工人,为未来探途铺路的石子。”

#### “笨人做笨功夫”

“我们是笨人,做的都是笨功夫。”张新民用“笨功夫”来概括团队整理文书的过程。

文书散藏于乡村民众家中或县级档案馆,多为手写文本,混杂着方言俚语、异体字和民族语言记音,考释难度极大。“有时候一个字要研究半个月才能确定,比翻译外文书著作找对应名词还难。”

为了保证考释的准确性,团队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反复与当地民族学专家研讨,带着这份“偏强”在山乡间寻找答案。“启功先生作为大书法大家,还会向邮差请教认草书,我们更得虚心。有些字典上都没有的异体字,得反复查证,既要请教地方专家,也要请教村民。”张新民回忆,团队常带着问题下乡,找当地既懂汉语又懂民族语言的地方精英帮忙,把文书念给他们听,逐一核对字音、字义,一点也不敢马虎。

张新民介绍,早期的清水江文书,以民间买卖的白契为主,随着中央王朝力量的进入,加盖官印的红契逐渐增多,契约呈现出越来越规范的变化趋势。不同民族地区之间的契约,在文字书写、纸张方面都有微妙差异。“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清水江文书中曾发现过遵义人的买房文书,就像现在的遵义人在清水江流域买房置业;也发现了徽州文书的身影,还有晋商、徽商的买卖合同,能清晰看到各地交流往来的历史痕迹。”

面对数十万件浩繁杂乱的手写文书,张新民团队选择以“他者”的眼光为文书定位:借鉴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的整理经验,发挥自己本来固有的优势。团队严格遵循文书的“在地性”与“归属性”原则编排,明确每件文书出自何县、何乡(镇)、何村、何户,从而最大化地保持其原始归户形态。同时,全书采用“文图对照”的形式,左边影印文书原件,右边对应整理考释后的规范文字,方便学者解读并厘清历史事实真相。

#### “把知识还给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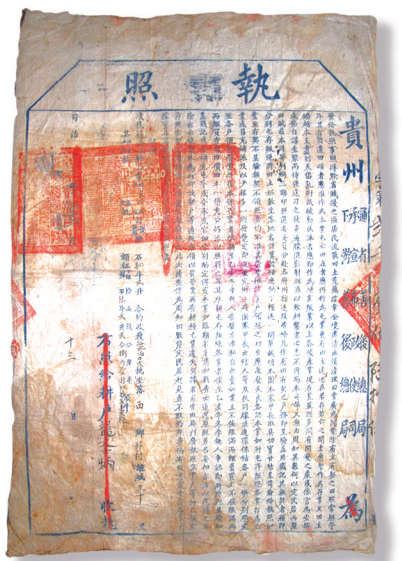
“这些文书来源于乡村,最终还要回到乡村。”在张新民看来,清水江文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研究,更在于其内涵了大量的乡土性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经过系统性的整理和理论升华后,再以普遍化的形式返回乡村,必然能为当代乡村的发展提供极为重要的借鉴,反哺乡村。他介绍,文书里蕴藏着数百年来地方生计劳作、秩序运作、社会治理、生态保护、民族融合等的鲜活智慧与经验,“大规模地贯通汇集起来就是一部乡村生活的‘百科全书’,能清晰看到基层社会的运作模式和族群交往的生动历史。”

木材贸易是清代清水江地区的支柱产业,是重要的地方经济来源。在此背景下,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历史悠久,形成了种、管、伐、售、再种的可持续循环体系,当地森林覆盖率至今保持较高水平。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与社区治理建设,对今天的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极具启示意义。

“我们把这些知识加以系统研究和理论提升后,当然应该把它带着丰富性和可行性还原回去,让乡民重新受益。”张新民认为,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是一个“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循环过程。第一步是将深藏乡间的文献加以整理公布,供学界广泛研究,形成认知中国多民族社会的“西南视角”;第二步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最终,这些提升后的知识系统应反馈于当地发展,助力新农村合理建设与文化转化创造。

2011年,张新民从清水江畔的文斗苗寨带回几颗银杏树种子,播种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围墙内外。这些来自文书故里的种子,在异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书院内的银杏树没有长起来,而墙外的6棵银杏树已经高过院外的围墙了。”张新民笑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些银杏树见证了我们与清水江两岸乡民的情谊,象征着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必然实现清水江文书从乡土社会中来,又向乡土社会中去的知识循环传承和提升发展之路。



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贵州通省善后总局等发放汉民龙学炳土地执照。资料图片